

三十四年)	(40)
图4 乾隆年间广东各府州的米价水平	(54)
图5 北江水系的米粮地区差价(乾隆二十一年一月)	(70)
图6 18世纪广东米粮中长途贩运线路	(74)
图7 1751—1770年广东米价的季节变动	(122)
图8 惠、韶、琼三府米价季节变化比较(1751—1770)	(124)
图9 不同时期广州地区米价季节变化比较	(135)
图10 米价变动的同步性——价格相关分析(1750—1769)	(141)
图11 米价变动的同步性——价格差相关分析(1750—1769)	(142)
图12 1707—1735年广东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146)
图13 1735—1800年广东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148)

序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并不以它研究的问题大小来决定。在学术史上,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常常都是从新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建立起探索的新架构,从而在研究科学的方法上有所创新。这种“小题大作”的风格,更能体现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学术上的贡献,也不见得会比那些宏论阔论逊色。当然,小题能否大作,作品是否尖在而富新意,就有赖于作者的眼光和功力了。陈春声这部著作,从18世纪广东一个省区的米价分析入手,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标准,问题实在不算小。但相对于时下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许多纵横古今中西的宏篇巨制来说,把对一个省区在一个世纪中的米价分析写成一本约25万字的专著,也算得上是“小题大作”了。

不过,正是这样一部“小题大作”的著作,在它的草创阶段,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当它的雏形还只是一份中山大学硕士论文的油印本时,就已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辗转流传,并得到了海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后来,陈春声在傅衣凌和杨国枢教授指导下,进一步把它写成博士论文后,这一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所取得的成就,更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可。由此看来,一部成功著作的影响,是不会受其讨论对象的地域和题材的限制的。

本书最具特色之处,是数量分析方法运用。作者借助电子

计算机,处理了近十万个的粮价数字,在一系列较复杂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米粮价格背后的市场关系,并结合各种记述性资料的诠释,揭示了18世纪广东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动态。虽然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据资料,把数量分析引入到历史叙述中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史学方法,应该是在5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随着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以及关于数量研究方法论的逐步完善,计量研究已经显示出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特长。特别是经过以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经济史学派为代表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努力,数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优点和局限,都已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了解。在国内,计量方法的运用也是近年来讨论史学新方法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介绍或提倡者居多,付诸实践则少有进展。在经济史研究中,虽然对量化资料和定量分析的重视,已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大多还只限于数据的列举和简单的算术处理,采用数理分析方法处理数据,得出原始数据本身不能直观地反映出来的结论的研究,就罕见力作面世了。就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某个具体的经济史问题而言,春声的这部书也许还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著。

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在经济史研究中采用计量方法,其意义还不只在于多了一种新的研究手段,而在于它是中国历史学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一重要一环。中国的人文学科比较缺少分析性和实证性研究的传统,即使在经济史这种对精确性和科学性有更高要求的领域中,研究者最轻车熟道的研究方法,也一直是凭着智慧和直觉体验来解释文献中那些零星的记述性的记载。更多地运用计量的方法,用数理分析的手段来处理各种数字的和非数字的质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通向科学化的一条简单和基本的途径。在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中,这种体现了19世纪以前计

学主义的实证精神的方法,当然算不上是最先进的。只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计量方法适用面的扩大和数据处理能力的高,才真正带有现代色彩。就中国目前的历史学研究来说,要从传统的方法走出,实现向当代社会科学的转变,大力提倡包括计量研究在内的各种理性化的科学方法,实为必不可少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春声的这项研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里,仍属一项前驱的工作。

对于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量方法的批评,常常担心以至指责研究者对计算机和数字的迷恋超过对历史事实本身的兴趣。事实上,在史学研究中,数量资料 and 计量方法的运用,确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成熟的计量研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这种局限的存在,并发展出一套方法来缩小或避免其影响。真正高明的计量史学家,从没有奢望计量研究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他们只是把计量的方法,作为验证某种假设或理论概括,启发新思路,发现新问题,修正错误的一种有效手段。而理论概括和理论假设的建立,还需要其他描述性材料和常识的支持,需要历史学家从其他研究成果中获得的歷史感和判断力的支持。本书的出色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成功地运用了数理分析的方法,更在于它成功地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数学资料 and 描述性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在书中利用的描述性材料之丰富,一点也不比许多叙述性的历史著作逊色,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作者独力搜集和第一次引用的,並示出作者在用传统方法搜集和利用史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本书的许多结论,是在数理分析的结果与根据描述性资料获得的认识相互参证的基礎上作出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单纯的定量分析所能产生的错误,又能获得许多单纯由描述性材料所不能直接得到的认识。

只是在方法论上谈论本书的意义,未免有舍本求末之嫌。其

者新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无限欣慰，所以很愿意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写下一点感想。

汤明槐

1991年8月2日于多伦多

实，春声这项研究的另一贡献，在于他从18世纪广东的条件分析入手，围绕着一个地区商品经济有了较明显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的发育程度、运作方式和发展趋向，以及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对传统中国后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这些在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见解，既不是老生常谈，又不是哗众取宠的空论，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必会留下它的痕迹。但要深刻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下的市场机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书某些论断也许会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补充和阐释。

本书是一部经济史的著作，不过，以传统社会为对象的经济史研究，恐怕只是出于寻求新课题和解释因果关系的需要，也常常不可避免地深入到社会史的领域。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受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从社会总体上把握经济现象的趋势。当代的经济史已经摆脱了划地为牢的学科藩篱，越来越具有一种全面的综合的历史阐释的色彩。陈春声对粮价和市场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单地的经济分析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关系、社会心理以及社会变迁的层面展开分析。对民间基层社会研究的重视，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对传统农村基层社会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尽管本书已经提出的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但书中表现出来的把区域经济发展和基层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的旨趣，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陈春声先后就读和任教于中山大学，其间又一度师从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两所大学，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梁方仲先生和傅衣凌先生的多年耕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风。在陈春声的这部著作里，这些传统和学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看到老一辈学

目 录

图表索引

序.....	汤明澂 (1)
第一章 导言	(1)
学术史的回顾.....	(1)
本书的基本研究构想.....	(8)
本书的材料与方法.....	(12)
〔第一章注释〕.....	(15)
第二章 米粮地区差价与米粮市场的运作	(18)
第一节 广东与省外的米粮贸易.....	(18)
一、粮食短缺与广东人的经济选择.....	(19)
二、广东与闽、赣、湘三省的米粮贸易.....	(30)
三、广西向广东的米粮输出.....	(39)
四、洋米进口的开始.....	(47)
第二节 广东省内的粮食贸易.....	(52)
一、米粮地区差价与各梅州内部的粮食调剂.....	(52)
二、米粮地区差价的计量分析.....	(63)
三、跨梅州的水粮运输.....	(63)
第三节 市场的中心与米粮贸易.....	(75)
一、作为广东米粮贸易中心的广州和佛山.....	(76)
二、县城与农村墟市上的米粮贸易.....	(86)
第四节 米粮市场上的商人.....	(91)

三、常平仓和社仓的管理	(227)
四、仓储形式更替与义仓的出现	(239)
〔第四章注释〕	(250)
第五章 结语：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265)
〔第五章注释〕	(276)
附录一 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	(278)
一、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基本情况	(278)
二、粮价单的可比性问题	(281)
三、粮价单的可靠性问题	(283)
〔注释〕	(288)
附录二 康熙四十六年至雍正十三年（1707—1735）广东米价	(291)
附录三 乾隆元年至嘉庆五年广东米价数据的资料来源	(313)
附录四 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有关18世纪广东粮价的记载	(321)
后记	(335)

一、长途粮食贩运中的商人	(92)
二、省内市场上的粮食运销商	(96)
〔第二章注释〕	(102)
第三章 米价变化的动态分析	(120)
第一节 18世纪广东米粮的季节差价	(120)
一、全省米价季节性变动的方式	(120)
二、各府州米粮季节变价的比较	(123)
三、粮食仓储与米价变动的关系	(128)
四、不同时期广州地区米价季节变动程度的比较	(134)
第二节 关于市场整合的数量分析	(137)
第三节 18世纪广东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141)
一、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145)
二、人口压力对米价的影响	(151)
三、货币流通与物价上升的关系	(165)
四、物价缓慢上升的社会后果	(172)
〔第三章注释〕	(180)
第四章 粮食问题与基层社会	(188)
第一节 政府、士绅与粮食流通	(194)
一、政府对粮食流通的管理	(199)
二、“蠲余”与“禁遏余”——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冲突与调适	(195)
第二节 赈灾和救济	(201)
一、米价循环变动与政府、士绅在救灾中的作用	(201)
二、常平仓与米价的不规则变动	(207)
第三节 粮食仓储与社会控制	(214)
一、清代广东常平仓和社仓的建立	(214)
二、仓谷的捐纳与捐输	(218)

图表索引

表 2—1	18世纪的广东人口	(20)
表 2—2	18世纪广东各种粮食的需求量	(23)
表 2—3	清中期广东各地的地租量	(25)
表 2—4	18世纪广东各种粮食亩产和所需耕地面积	(26)
表 2—5	潮州、泉州和台湾的米粮地区差价(乾隆十至二十一年)	(31)
表 2—6	广州府与梧州府的米粮差价(乾隆二十一至三十年)	(42)
表 2—7	18世纪中期暹罗的大米出口	(49)
表 2—8	18世纪广东各府州米粮地区差价	(53)
表 2—9	乾隆中期广东各府州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65)
表 2—10	乾隆中期与20世纪30年代广东各地人口和耕地面积在全省所占比例的比较	(66)
表 2—11	18世纪广东米粮地区差价离散程度的变化	(67)
表 2—12	18世纪中叶广州城与广州府的米中米差价(乾隆三十至四十二年)	(82)
表 3—1	广东米价的季节变动(1751—1770)	(121)
表 3—2	广东各府州米价季节变动(1751—1776)	(125)
表 3—3	清代乾隆年间广东各府州人均仓储量	(129)
表 3—4	乾隆年间广东社仓积谷出借率	(131)
表 3—5	1931—1936年广州的米粮季节差价	(135)

表 3—6	各府州逐年平均米价的相关分析(1750—1769)(插图)	(145)
表 3—7	各府州逐年平均米价差的相关分析(1750—1769)(插图)	(147)
表 3—8	1707—1735年广东年平均米价	(149)
表 3—9	1736—1800年广东年平均米价	(155)
表 3—10	18世纪广州丝价	(160)
表 3—11	长乐县帖坑村徐氏宗族向外移民统计	(167)
表 3—12	18世纪广东垦亩数	(171)
表 3—13	地方志中关于清代前五朝广东粮价记载所用货币单位统计	(173)
表 3—14	乾隆年间广东银钱比价	(178)
表 3—15	18世纪广东雇工工价	(208)
表 3—16	18世纪广东年平均米价离散程度的阶段性变化	(209)
表 4—1	清代历朝广东饥荒统计	(223)
表 4—2	乾隆年间广东各府州饥荒分布及其与人均常平积谷量的关系	(224)
表 4—3	清代广东常平仓谷的构成(插图)	(241)
表 4—4	清中期广东各府州仓储积谷数	(32)
表 4—5	雍正至乾隆初广东社仓积谷数的变化	(35)
表 4—6	乾隆年间广东的社仓缺额	(35)
图 1	乾隆初年潮州、泉州、台湾的米价趋势	(32)
图 2	韩江流域的米粮地区差价(乾隆二十八年四月)	(35)
图 3	西江流域的米粮地区差价(乾隆十五至	

图 4	三十四年).....(40)
图 5	乾隆年间广东各府州的米价水平.....(54)
图 6	北江水系的米粮地区差价(乾隆二十年十一月).....(70)
图 7	18世纪广东米粮中长途贩运线路.....(74)
图 8	1751—1770年广东米价的季节变动.....(122)
图 9	惠、韶、琼三府米价季节变化比较(1751—1770).....(124)
图 10	不同时期广州地区米价季节变化比较.....(135)
图 11	米价变动的同步性——价格相关分析(1750—1769).....(141)
图 12	米价变动的同步性——价格差相关分析(1750—1769).....(142)
图 13	1707—1735年广东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146)
图 14	1736—1800年广东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148)

序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并不以它研究的问题大小来决定。在学术史上，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常常都是从新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的剖析，建立起探索的新架构，从而在研究科学上有所创新。这种“小题大作”的风格，更能体现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学术上的贡献，也不见得会比那些宏论阔议逊色。当然，小题能否大作，作品是否尖在而富新意，就有赖于作者的眼光和功力了。陈蕃声这部著作，从18世纪广东一个省区的米价分析入手，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标准，问题实在不算小。但相对于时下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许多纵横古今中西的宏篇巨制来说，把对一个省区在一个世纪中的米价分析写成一本约25万字的专著，也算得上是“小题大作”了。

不过，正是这样一部“小题大作”的著作，在它的草创阶段，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当它的单形还只是一份中山大学硕士论文的油印本时，就已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辗转流传，并得到了海外同行的高度的评价。后来，陈蕃声在傅衣凌和杨国楹教授指导下，进一步把它写成博士论文后，这一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所取得的成果，更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可。由此看来，一部成功著作的影响，是不会受其讨论对象的地域和题材的限制的。

本书最具特色之处，是数理分析方法运用。作者借助电子

第一章 导言

本书讨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经济区域的米粮贸易和粮价变动问题。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品、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物，在传统中国还是最大宗的商品。粮价变动不但反映市场的粮食供需和货币流通情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和代表了其他物价的变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物价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整个市场的运作机制，以及与市场机制有复杂互动关系的社会文化的各种特质。

学术史的回顾

清代物价史的研究至迟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在1949年以前的近30年的时间里，本领域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清代价格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方面。柳诒征的《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之米价》^①发表了从官私文书中搜集到的东晋至民国初年江苏的一批米价材料，以表格形式公布了江苏国图图书馆档案馆藏光緒年间江苏各府州县逐月呈报的米价细册。盛俊的《清乾隆期江苏省物价统计》^②，主要根据《钦定物料价值》一书，以表格形式整理并分析了乾隆年间江苏的各种物料、工食的官定价格。吴蔚的《清代米价》^③是一篇短文，但它最早引用了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河北宁津县大柳镇商店的旧帐本，公布了道光十四、十五

两年该地方各种粮价的记录。

特别要提到的是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对清代粮价单整理的编纂工作。30年代,以汤象龙先生为首的一批研究者,在困难的条件下,对清代档案中的社会经济资料作了大量抄录,他们用近代统计方法,以表格形式整理了道光至光绪年间全国各省的2600多份粮价单,并按省装订成册,这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资料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在1949年以前公开发表的清代物价史的研究论著中,还包括了应奎的《近六十年之中国米价》^{〔4〕}、寄萍的《古今米价史略》^{〔5〕}、《实业来复报》刊登的《中国六十年米价比较表》^{〔6〕}、上海市社会局《上海最近五十六年米价统计》^{〔7〕}和张履善的《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8〕}等。

在1949年以后的研究中,彭信威先生于1954年出版了《中国货币史》一书,其中对清代物价问题作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9〕}。彭先生是从货币购买力的角度讨论物价问题的,他分析了清代铜钱、银两购买力不断下降的事实及其原因,考察了这一情况对物价变化的直接影响,其中从各种官私文书中辑录的大量物价资料(特别是米价资料),至今还常被人们所利用。1955年出版的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根据河北宁津县大柳镇统泰升记商店的出入银两流水帐、买卖总帐、四乡帐、四街帐和柴胡店帐,计算了1800—1850年该地区的零售物价和银钱比价指数^{〔10〕}。邹大凡、吴智伟和徐爱惠的《近百年来旧中国粮食价格的变动趋势》^{〔11〕}根据《银行周报》和《中国货币史》的有关记载,开列了1841—1949年上海中等梗米的价格及其指数,分阶段讨论了这一时期上海米价的上漲,从生产、人口、市场和银钱比价等方面,分析了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

在最近十年的研究中,陈支平的《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

熟荒》^{〔12〕}和《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13〕}是两篇值得注意的论文,这两篇文章利用从地方志、笔记等文献中收集的粮价极端值,从过去人们不太注意的粮价不规则变动的角度讨论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与社会情况。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粮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14〕}利用中外文献论述了1870—1900年间国际银价下跌、国内银钱比价变动的情况,认为中国货币双重本位制所产生的双重汇率使该时期进口物价较内地物价为低,有利于洋货的倾销,阻滞了出口贸易,从而对该时期国际银价大幅度下跌而中国商品进口及贸易入超却迅速增大的矛盾现象作了解释。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农民卖粮所得释例》^{〔15〕}利用方志、笔记、文集等文献中的粮价资料,说明康熙后期至嘉庆百多年间湖南和江南地区的粮食地区差价缩小,湖南农民的卖粮所得有增加的趋势,作者进而分析了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粮食市场价格的形成和粮价变动对农民生活的实际影响。

近40年来大陆学者有关清代物价研究的论著还包括冯汉镛《清代的米价与地主操纵》^{〔16〕}、邓云乡《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17〕}、吴景尧《清前期农业雇工的工价》^{〔18〕}、谢天佑《气稔·收成·粮价·民情——读〈李煦奏折〉》^{〔19〕}、陈金陵《清代的粮价奏报与其盛衰》^{〔20〕}、刘见《清代粮价奏折制度浅议》^{〔21〕}和王道端《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22〕}等,后面几篇文章对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各方面情况作了介绍。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清代市场、商品生产、地权转移、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时,对物价问题也有所阐述。

台湾地区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台湾当地的物价变动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王世庆的《清代台湾的米价》^{〔23〕}、周省人《清代台湾米价志》^{〔24〕}、和李宽世、黄典权的《清代台湾地方物价之研究》^{〔25〕}。其中周省人的文章搜集了

康熙至光绪八朝的米价资料，讨论了台湾米价与年成丰歉、台米外运和战乱治平的关系。

迄今为止，在清代物价史研究中学术贡献最大者，首推香港新亚研究所的全汉升教授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王业键教授。

全汉升先生在本领域的主要论著有：《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乾隆十三年米价问题》、《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清康熙年间（1662—1722）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与王业键先生合作的《清雍正年间的米价》、《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和《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变动的趋势》^{〔29〕}。他与克劳思（Richard A. Kraus）合作的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27〕}（《清中叶的米粮市场和贸易》）一书，是最早出版的清代物价史专著，全先生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描述了清代的粮价奏折制度并系统考察了粮价奏报的可靠性问题，以18世纪白银的输入说明当时物价的上升趋势，研究了以苏州为中心连结山东、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江苏、浙江等省的米粮市场的运作情况，并通过对18世纪初与20世纪初江南米价季节变动的比较，说明该市场的流通机制和有效性；他还考察了清政府对待米粮贸易的政策和在保证粮食供应方面的工作，等等。在材料运用方面，他从《李煦奏折》和《雍正硃批谕旨》中辑录出大量米价资料，这个工作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他还把经济统计方法运用于米价季节变动的分析之中。全汉升先生对唐、宋、明各代的物价都作过精湛的研究，所以关于清代物价史的分析有一种人所不及的洞识。他又把清代物价置于同时代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表现了一种世界性的眼界。尽管后起的研究者们在资料利用、研究方法和具体结论等方面都有着的发展，但许多人都明显地受到全先生的影响。他在这个领域的贡

献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性质。

王业键教授有关清代物价史的论著除了上述与全汉升先生合作的以外，还有The Secular Trend of Pric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清代物价的长期趋势》）^{〔30〕}、《清代粮价陈报制度》^{〔31〕}、The Secular Movement of Grain Price in China, ca. 1760—1910（1760—1910年中国粮价的长期变动）^{〔32〕}和《18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33〕}，与黄国枢合作的《18世纪中国粮食供需的考察》^{〔34〕}等。王先生是第一个在研究中系统运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粮价清单的学者，在粮价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的研究比较注意东南地区，研究范围扩展到过去人们较少系统研究的清代后期。在对18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粮价变动的长期趋势的研究中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了数理统计方法，并对地方社会状态也给予较多注意。王先生对清代赋役、货币等问题都有过引人注目目的研究，他在本领域的工作富于启发性，而且显示出一种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

美国学者威尔金森也对清代物价问题进行过研究。他197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35〕}（《中国物价史研究》），利用本世纪初十年陕西的粮价细册（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考察了银钱比价和稻米、小麦、小米、豌豆价格的变动，以验证统一市场是否存在。他的The Nature of Chinese Grain Price Quotations 1600—1900^{〔36〕}（《清代粮价单的性质》）则讨论了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

1987年底在深圳举行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几位来自美国的学者对清代粮价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注

花、生丝、棉布、田产和工食价格变化的关系，并对康熙前半期粮价下跌的原因进行分析，评述了当时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关于粮价、货币、市场等问题的种种议论。1987年发表的《清代物价史研究的现状》^{〔30〕}一文对清代物价史的研究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就该领域今后的课题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意见。松田吉郎的《京都府米价变动向と米穀需給調整——明末より清中期を中心として——》^{〔40〕}利用地方志中的记载描述了从明景泰元年至清咸丰七年广州府的米价变动，从钱粮减免、常平仓、社仓、义仓等方面讨论了官府和地方士绅、商人在保证米粮供应方面的作用。安部健夫的《米穀需給の研究——「雍正史」の一章としてため一》^{〔41〕}在讨论雍正时期国内米粮市场时，对各地的粮价也有所论及。讨论同一课题的还有则松彰文《雍正期における米穀流通と米价变动》^{〔42〕}。日本学者的研究注重利用地方志、笔记和《雍正硃批谕旨》中的材料，对数量庞大的清代粮价单还很少利用，也不象美国学者那样采用大量的统计分析方法。他们的工作或多或少受到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主流学派的影响，对政权、乡绅、地方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等问题给予了较多注意。

布罗代尔（F. P. Braudel）和斯波纳（F. Spooner）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所写的《Price in Europe from 1450—1750》（《1450—1750年欧洲的物价》）一章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价格史不是也不可能只是历史的唯一解释，它仅是试图从一个方面使过去人类活动的复杂的真实简化起来。它是对这种历史真实的一种不完全的评估，但具有运用非人格化的复杂的统计证据的优点。在习惯这种特殊语言或接受这种分析工具时，历史学家们无疑会发现一些困难。因此，在这个各种观点错综复杂的领域中，小心和谨慎是必要的。但是，只有我们超越了些些讨论，从而把握并解释整个历史序列时，小心和谨慎才有了

意。李中清等的《Pric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in Rural Fengtian 1772—1873》（《1772—1873年奉天农村的物价与人口史》）把作者进行多年的人口史研究与粮价史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了收成和粮食外运对当时奉天粮价的影响以及当地谷物的可替换性，对粮价与人口关系的统计分析发现，粮价对出生率有较大影响，说明满足是一种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王国斌等的《Grain Market and Food Supplies in 18th — Century Hunan》（《18世纪湖南的谷物市场与粮食供应》）通过对当时湖南省内米粮贸易空间模式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说明米粮贸易的规模和范围，还讨论了粮价的季节变动和年度变动方式，说明了18世纪湖南米粮市场的整合程度。渡德培（Peter C. Perdue）的《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1739—1864年清政府与甘肃粮食市场》）从仓储、军需和市场整合程度等方面考察了当时甘肃米粮市场的情况及清政府对该市场的影响。马立博（Robert Marks）的《Rice Pric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Liangguang, 1738—1969》（《1738—1769年两广米价与市场整合》）讨论了当时两广米粮供需的大致情况和地方市场的粮食来源，用数理分析方法考察了两广米粮市场的整合情况。^{〔39〕}上述学者的研究有明显的计量历史学的色彩，他们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做过较长时间的粮价资料蒐集工作，研究中大量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并发展起一套被较多人采用的研究粮价变化的数理分析方法。

日本学者关于清代物价史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对这一课题着力较多的是岸本（中山）美绪，她的《清代前期江南的米价变动向》^{〔36〕}、《清代前期江南的物价变动向》^{〔37〕}和《康熙年间の穀賤について——清初经济思想の側面——》^{〔38〕}等论文讨论了从万历至乾隆末年江南地区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及其与稻

意义(“物价史本身也才有意义”)^{①②}。这种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以往有关清代物价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也毋须讳言,迄今为止的研究与“把握并解释整个历史序列”的期望相比,仍有很大距离。大体说来,由于学术传统和学术背景的差异,以往关于清代物价史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一部分学者注重计量研究,大量运用清代粮价单所提供的数以万计的粮价数据,注意对市场机制的探求,其研究有着较为科学化、非人格化的特点,但较少注意基层社会的状况,较少注意定性资料的分析利用,其结论往往有较明显的推测性。这一学术风格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另一部分学者重视公私文献中各种记载的分析利用,注意利用物价变化来说明阶级关系、租佃关系、基层社会组织、权力结构、雇佣劳动等中国史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对大规模的计量分析缺乏兴趣,对与物价直接相关的市场问题的考察大多为定性的描述,对史料的解释有较明显的随意性和或然性。大致上说中国和日本学者更多地受这种学术风格的影响。作者认为,至少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把这两种风格统一起来是可能的,而且这种统一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对历史整体的更全面的理解。

本书的基本研究构想

本书的研究就是基于上述对学术史的认识,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毋庸讳言,物价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是一个长期得不到重视的领域。一方面,这种研究往往必须处理大量的数字型材料,历史学家们在理解和使用电子计算机、数理统计等分析

手段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另一方面,我们长期实行国家以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政策,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多年不变,价格变动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和调节作用被削弱到几乎被人忘却的程度。价格史研究被忽视与这种情况有很大关系。现在,由于政治、社会 and 学术的各种原因,中国史学正经历一场重要的变革。史学从业者的学术素养、知识结构和问题意识有了较大转变。史学研究的课题、理论、方法和价值标准也随之发生着带有预示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培养市场机制和利用价格杠杆的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势下,对物价史研究给予必要的注意,无疑是有理由和条件的。本书集中考察的是18世纪的广东地区。

18世纪对传统中国社会研究来说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期。当时最引人注意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迅速的人口增长。在这100年间全国人口至少增加了一倍。1790年全国人口统计首次突破3亿大关。^③堪称为奇迹的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这一空前的人口压力并未带来普遍的饥荒或动乱,人口增长的势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④这一经济奇迹出现的原因,除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趋势外,国内市场在保证各区域粮食供需平衡方面的有效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对这一时期粮食供需和米粮贸易状况的考察,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和发展道路的认识。正如许多学者考察过的,在被称为“康乾盛世”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从自身内部产生过一些新的因素,当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市场交换活跃,进入市场的产品大大增加,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社会流动性加强,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仅仅从经济关系考察,这些现象无疑可被视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共生物。问题在于,这种具有明显

“中国特色”的商品经济有着什么样的导向性，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最终不能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近代化变革？对这个困惑中国史研究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问题，必须综合考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从文化价值层面上提出新解释。而在这个层面上，所有的经验性检验都是片面和力不从心的，这种解释就接受的基石不是一件两件事实或几条史料，而是在大量个案研究、区域研究、计量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感。本书所进行的研究的意义可从这一角度得以理解。本书选择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期中某个典型经济区域的典型问题进行考察，并且始终关注这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最有影响的理论课题，但决不奢望能直接证实或证伪有关这一课题的各种假说和解释。我们所能希望的是，如果能有更多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同类型和其它类型的基础研究，也许最终能在这些研究所形成的历史感的基础上，提出某种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的新的解释。

正如本书将要证明的，广东（特别是珠江和韩江两个三角洲地区）是当时国内经济最繁荣、商品货币关系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经历了清朝初年清兵与南明政权的拉锯战、藩王肆虐与三藩之乱、以及“迁海”等一系列动乱事件之后，17世纪末广东经济开始恢复。18世纪广东在出现一系列新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人口增长及其所造成的粮食短缺的巨大压力。本书以广东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非有意强调其特殊性，而是因为其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情形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中带有某种先兆和预示的性质。

物价是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标志物。对稻米这样一种典型商品的价格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价格资料具有系列性和非人格化的特点，这种分析又是其它类型的研究所难以取代的。

首先，价格是一种市场现象，它不但反映市场上商品的供需状况和货币流通情形，而且潜在地表现了市场发育的程度及其有效性。本书通过对18世纪广东省内各地以及邻省的米粮地区差价的分析，勾画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联结数省的多层次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运作情况；同时期米价的上升趋势又使我们注意到乾隆初年以后广东货币流通量加速增长的情形与背景；对米粮季节差价的变动方式与变动程度、以及各地区间米价变动同步性的探讨，使对当时两广区域市场的有效性和整合程度的研究得以建立在一种可比性较高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的研究几乎涉及18世纪广东米粮市场所有重要的内容和因素。

其次，对米价的分析，还使我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中国传统中国晚期与市场运作有关的其它经济情形。例如，对粮食短缺压力下广东人所作的经济选择及其原因，各级市场上各类商人的经济活动及其价值追求，物价长期上升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运作的一些带根本性的特点，等等，本书都力求深入地作了讨论和分析。

又次，传统社会中实际的经济发展，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经济运作是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在特定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制约下进行的。所以，物价研究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市场或经济领域，而应同时关注范围更广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内容。本书分析了米价循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时政府和士绅的行为，说明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对粮食流通中各种社会力量对米价和其它经济变动的反应作了较详细描述，以求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集团和利益冲突及其调适的原则和前提；对广东粮食仓储制度演变的研究，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控制的方式及其变化趋势。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讨论了社会流动、社会心理变化、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等等方面的问题。

总之，在我们的研究中，米价不仅被看作一种实在的经济现象，而且也被理解作为一种符号或象征。我们不但要分析米价变动的方式、规律及其市场背景，而且希望尽可能丰富地揭示其社会和文化内涵。从逻辑上说，本书的基本构想是以米价剖析市场，通过市场反映经济，再透过经济理解社会。不过，在实际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因素，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互相纠缠互为因果的形式。这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部历史学的著作，过程再现必须优先于结构重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所谓“因果”、“结构”、“层次”等等概念固然有其客观基础，但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人们为了分析客观过程而作的主观界定，实际的历史发展是不按逻辑上各种因素的先后顺序或因果关系来进行的。

本书的材料与方法

本书所依据的有两个主要资料来源：一是清代档案中的粮价单和雨水粮价奏折；二是清代以后的广东地方志。

清代粮价奏报制度建立于康熙中叶，现存最早的粮价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七月苏州织造李煦关于苏州府雨水和米价的报告⁴⁶，而笔者发现的关于广东的粮价奏折以康熙四十六年八月为最早⁴⁷。从乾隆元年五、六月开始，又有了督抚逐月奏报的以府州为单位的粮价单。附录一就这一制度建立的经过和一般情况、粮价单的可比性与可靠性问题作了说明。本书所使用的米价数据中，康熙、雍正二朝的主要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和《雍正硃批谕旨》，具体数据请参阅附录二。乾隆、嘉庆

二朝的数据绝大部分是作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粮价单和雨水粮价折中收集的，个别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这些数据数量庞大，本书未能将其全部刊刻公布，但附录三详细开列了它们的出处。当然，我们也大量利用了上述档案和奏折汇编中的叙述性材料。

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二节还利用了乾隆年间广西几个府州的米价数据。这份资料承蒙美国加州慧德学院副院长马立博教授惠赠，这是他1985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从清代粮价单中收集的。

笔者翻阅过的清代以后的广东地方志有260多种，从中收集到的粮价数据参见附录四。不过，本文所利用的大多是地方志中的叙述性资料。

本文所刊用的资料还包括清代档案中的前三朝题本和乾隆朝刑科题本，以及政书、笔记、族谱、碑刻等有关资料。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计算、分析米价数据时较多地利用统计学的数理分析方法，并在处理大量数据和进行较复杂计算时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这是因为，本文利用的米价数据近十万个，不能用一般的描述性方法加以把握，作者希望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更理性、更准确地说明所讨论的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是5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首先发展起来的，几十年间其影响遍及西方和东欧各国，成为颇为引人注目且目的计量历史学派⁴⁸。在以往对清代物价史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也较多地运用了这样的方法。关于历史学的计量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提倡者强调，计量分析具有形式化、准确、更适宜反映基层社会和大众生活、更加科学化等优点，可以较有效地排除史学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更接近真实地重现历史。而反对者则批评说，计量

研究适应的领域有限,人在这种研究中成为一种符号而失去人性的特点,某些研究者对计算机的兴趣大于对历史本身的兴趣,而且计量分析使史学著作失去其作为艺术品被鉴赏的价值,从而使历史学失去众多的读者和听众。作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必须有一种更为超越的态度。科学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科学工作者提出和检验假说、并说服别人的一种被从业者集团共同认可的程序,其扬弃和发展既是由于科学进步内在的动因,也是科学研究者学术信仰转变的结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没有那一种方法是尽善尽美的,也没有那一种方法绝对地优越于其他方法。计量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它反映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趋势,确实具有某些其它分析方法所未有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知道,计量分析本身存在许多弱点和局限,它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史学研究的其它方法,包括最传统的手段与方法。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爱德华·萨维斯基是有道理的:“对历史计量法最适当的估价可能是把它当做历史学家所有许多技术和方法中的一种,在需要用它的地方用它,用不着象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对它抱有过分的奢望,也不必象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那样对它过于敌视”(40)。

作者无意使本书成为纯计量的作品,而是尽量做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并重、数字材料与描述性材料结合。而且,在进行较复杂的数据处理或分析时,尽量略去繁琐的计算过程,只给出最后结果。这样做是想使全书的叙述更加流畅,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而对叙述性史料的引用则力求详细,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属首次引用,一般研究者不易读到,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不使读者留下计量研究可以取代文献学工作的印象。

近年来许多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为史学研究方法的创

新造了许多舆论。在现阶段,也许最重要的是拿出一批具体的实在的研究成果。如何在努力接近现代学术潮流的同时保持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如何在借鉴利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保持历史学本身的特色,这些都是有待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学术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书的错误和失误在所难免,恳切期望听到更多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第一章注释〕

- 〔1〕《史学杂志》第2卷,第8—4期(1930.9)。
- 〔2〕《学林》第2辑。
- 〔3〕《中央日报》1948年1月21日。
- 〔4〕《钱业月报》第2卷第3期(1922)。
- 〔5〕《苏二农月刊》第1卷第1期(1921)。
- 〔6〕《实业来复报》第1卷第23期(1922.6)。
- 〔7〕《社会月刊》第1卷第2期(1929)。
- 〔8〕《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
- 〔9〕参见《中国货币史》下册,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525—589页。
- 〔10〕《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8页,表31。
- 〔11〕《季刊》1965年第9期。
- 〔12〕《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 〔13〕同上,1988年第3期。
- 〔14〕《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 〔15〕《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 〔16〕《成都工商导报》增刊“学林”,1951年10月7日。
- 〔17〕《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4、5期。
- 〔18〕《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19] 同上, 1984年第4期。

[20] 同上, 1985年第8期。

[21] 《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8期。

[22] 《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

[23] 《台湾文献》第9卷第4期(1958, 12)。

[24] 《台湾银行季刊》第15卷第4期(1964, 12)。

[25] 《历史学报》(成功大学)第4期(1977, 7)。

[26] 上述论文除《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0卷上(1979)之外,

其余论文均已收入作者的《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新亚研

究所1972年版)。

[2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8]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2期(1972)。

[29] 《故宫季刊》第31卷, 第1期(1978)。

[30] “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者讨论会”论文, 其英

文摘要发表于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45(1982)。又见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9, 1

(1981)。

[31]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该文的英文稿以

Food Supply in Eighteenth-Century Fujian为题, 发

表于Late Imperial China 7, 2(1986)。

[32]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讨会”论文, 台北, 1989年8月。

[33] New York, Garland Pub, 1980。笔者未读过该书, 以下

介绍根据岸本美绪《清代物价史研究的现状》一文的评价。

[34]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14, 1983。

[35] 据笔者所知, 上述论文均已收入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

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一书。

[36] 《史学杂志》第87编, 第9号(1978, 9)。

[37] 《东洋史研究》第37卷, 第4号(1979, 8)。

[38]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89册(1982, 9)。

[39] 《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集(1987, 4)。

[40] 《中国研究》第8号(1984)。

[41] 安部健夫《清代史的研究》, 创文社1971年版。

[42] 《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4期(1985)。笔者未见。

[43]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75。

[44] 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1册, 北京大学

出版社1989年版, 第132—136页。

[45]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2, 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6] 《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册, 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第6页。

[47] 参见附录二。

[48] 参见项观奇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版。

[49] 爱德华·萨维茨《60年代的美国史学》, 《世界历史译丛》

1980年第2期。

第二章 米粮地区差价与米粮市场的运作

粮食是一种大体积、低价值的产品，长途贩运较难获利，所以古人有“千里不贩籴”^{〔1〕}的说法。但是，至迟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已有大规模的粮食贸易存在^{〔2〕}。清代由于人口压力和区域间经济分工的发展，粮食贸易的规模达到空前水平。就广东而言，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已可通过一个发达的多层次市场网络有效地获得粮食供应。

第一节 广东与省外的米粮贸易

清代广东省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广东、海南二省和广西南部的一部分地区^{〔3〕}。北回归线横穿本省大陆中部、全省为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年平均气温 $19^{\circ}\text{C}\sim 26^{\circ}\text{C}$ ，平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无气候意义上的冬季，有效积温从北到南由 6000°C 至 9000°C 不等。18世纪时，粮食作物一年已可两熟。珠江、韩江、漠阳江、鉴江等肥沃的江河下游平原，占有全省约四成的耕地，农业生产条件优越。

广东在历史上开发较晚，隋唐以前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与江南一带。宋元以后，由于士民南迁和江河三角洲的发育开垦，加之与国内外对经济联系日趋密切，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从南宋到明代中叶，广东一直是米粮输出省份，

宋代广州和潮州有米粮运往江浙地区和福建泉州、福州一带，明代福建也一直依赖从广东输入的粮食。^{〔4〕}广东缺粮的局面是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的，当时有“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东下”^{〔5〕}的记载，但广东向福建的米粮运输直至明末仍保持较大规模。

清代的情况有较大不同。清初屈大均已有“东粤少谷，恒仰资于西粤”^{〔6〕}之语，雍正五年又有“广东所产之米，即年岁丰收，亦仅足半年之食”^{〔7〕}的说法。整个清代广东一直是严重缺粮省份，其缺粮的局面而延续到本世纪50年代。

一、粮食短缺与广东人的经济选择

清代广东严重粮食短缺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长。

表2—1列出了笔者所找到的18世纪广东全省人口数字。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四十一年前后的人口数有巨大差别，这是因为人口统计方法的不同造成的。乾隆卅八年以前广东的人口统计为“编审人丁”数，编审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户或五六人止一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亦止一人交纳钱粮”^{〔8〕}，而且地方官员将此视为例行公事，凭空杜撰，毫无准确性可言。^{〔9〕}乾隆卅七年各地接到通知：“编审之例，无裨实政，永行停止”。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的人口统计为“保甲烟户”数，根据规定，“督抚所试按保甲门牌册实在民数，岁以十月同谷数造册送部”^{〔10〕}。这一做法没有制度上的缺陷，其可靠性取决于州县官员的认真程度。就广东的情况而言，该时期的人口统计仍然带有任意推测的成分，^{〔11〕}但比以前的编审数要可靠得多。从表中可以看出，从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间，全省人口由1480万增加到1645万，年增长率在5.7%至11%之间，平均约6.8%。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它意味着如果整个18世纪广东人口一直以此